

〔德〕安娜·弗兰克 著

少女日记

高年生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Het Achterhuis
Contact, Amsterdam, 1947

根据联邦德国海德堡 Lambert Schneider 出版社德译本
《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1958 年第 5 版译出

责任编辑：全保民

少女日记

Shaonü Rij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1}{16}$ 插页 5

198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990

ISBN 7-5016-0056-2/I·57

定价 3.45 元



安娜·弗兰克



安娜·弗兰克躲藏的楼房

译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娜·弗兰克的日记。

安娜·弗兰克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伴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她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娜——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情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娜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是安娜的十三岁生日。在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娜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小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娜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娜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娜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娜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

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日记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写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科夫伊斯和克拉勒都被逮捕，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盖世太保总部。他们被监禁了几个星期。科夫伊斯因病保出就医，克拉勒被送到荷兰的一个集中营里。弗兰克一家、范丹一家和杜赛尔被送到维斯特博克去。九月三日，这八个犹太人坐在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最后一艘轮船上离开了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安娜、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挑选出来，送到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终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一九四五年二月，党卫队在苏军进击下逃离奥斯威辛，把彼得·范丹带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奥托·弗兰克活了下来，被苏军解放。

在贝尔根—贝尔森，安娜曾遇到她的同学黎丝。后来黎丝回忆那次见面的情景说：“天黑了，我等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久，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黎丝，黎丝，你在哪儿？’是安娜在喊我。我顺着声音找去，看见她在铁丝网那边，衣衫破烂。夜里很黑，我勉强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晒黑了的面孔，

一双眼睛显得很大。我们哭了又哭，因为这时候我们当中，除了隔着一层铁丝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告诉安娜，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快要死了。安娜告诉我，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的情况，她母亲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里只有玛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以后，还看见过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玛戈特也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死去。一个生还者回忆道：“安娜那时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过几天后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临终时她很平静，不觉得有什么不幸降临到她身上。”死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强盗的摧残下，一个含苞欲放、才华横溢的少女就这样夭折了。

战争结束后，奥托·弗兰克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的朋友米普和艾莉将安娜的日记和手稿交给他。这些都是她们在盖世太保袭击后屋后在旧书报堆中发现的。奥托·弗兰克把安娜的日记抄录下来，作为纪念，在亲朋中传看。一位荷兰教授建议将日记公开发表。弗兰克先生把日记略加删节，就以《后屋》为名，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很快就印行了好几版。一九五〇年，海德堡 Lambert Schneider 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文出版，第一次只印了四千五百册，当时德国很多书商还不敢把这本书陈列在橱窗里，但是这本书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接着，它又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单是在联邦德国，

仅菲舍尔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日记》袖珍本到一九八八年就再版六十余次，印数达二百二十三万五千册，一再被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其影响的深远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五五年，日记被改编成剧本，在纽约演出，得到巨大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奖。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话剧《安娜·弗兰克日记》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的七个大城市同时上演。在法国，日记也由乔治·纳孚改编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观众们从剧场出来时眼中都含着泪水，大家都为这个少女的真挚感情所感动。在阿姆斯特丹，朱丽安娜女王观看了演出。这个城市正是剧中事件发生的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演出的情况时写道：“当演出达到高潮和结尾——德国盖世太保猛击后屋门的声音响起时，剧场中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啜泣声。幕落下好几分钟，观众仍寂静无声。皇室成员离开剧场后，大家才站起来。没有鼓掌。”在美国，《安娜·弗兰克日记》于一九五九年改编成动画片，一九六七年拍成电视片。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后来又发现了关于安娜的更多情况。一九五八年，德国作家恩斯特·施纳贝尔发表了一部很动人的作品，他曾访问了四十二个熟识安娜或是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一九六三年，一个名叫卡尔·西尔伯鲍尔的维也纳警官被查明就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冲入后屋，逮捕弗兰克一家的盖世太保中士。他被撤了职，因为他隐瞒了这段罪恶的历史。一九六六年，曾在荷兰工作过的前党

卫队中尉威廉·哈斯特和他的两名助手在慕尼黑被捕。这三人被控告曾指挥流放近十万名荷兰犹太人到奥斯威辛去，其中包括安娜·弗兰克。在审讯他们时，一个当过党卫队少校的威廉·楚普夫证明，出卖后屋避难者的可能是弗兰克公司的一个雇员。那家伙得了一笔平常的奖赏：捉一个人得五盾（约合人民币十元）。西德法院判处哈斯特十五年徒刑，两名从犯分别被判处九年和五年徒刑。

安娜·弗兰克生前说过：“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她的愿望实现了。为了纪念她，荷兰成立了一个安娜·弗兰克基金会。这笔基金也用于未来的发展，帮助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提高修养。为此设立了一个国际青少年中心，作为各国青少年聚会的场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运河畔的那幢房屋被辟为安娜·弗兰克纪念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访问。

阿姆斯特丹市的孟特索利学校——安娜的母校——现在改名为安娜·弗兰克学校。在德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还有她的纪念处，代替她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无标志的坟墓。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日记被保存下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正如恩斯特·施纳贝尔所说：“她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这是几百万被压制的声音中的一个，它说出了这几百万人是怎么生活的……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著名的法国女作家爱尔莎·特丽奥莱写道：“安娜·弗兰克如果还活着，也许会成为作家、诗人。安娜·弗兰克的日记透露出一种早熟的才能，一种勾

魂摄魄的感染力……对于那些要对这件丑事负责的人，安娜·弗兰克应该引起他们痛切的内疚；对于那些曾和小牺牲者一起受苦、同样受苦和为她受苦的人，安娜·弗兰克的日记应当成为他们沉痛的回忆。安娜·弗兰克的日记具有崇高的人性，同时它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日记》的中译本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世界文学》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把《日记》全文译成中文，并交由某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在书箱里，尽管《书林》等刊物曾发表评论推荐它。一九八二年我去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娜·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在联邦德国，许多德国朋友劝说我再次努力使《日记》在中国出版，因为它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已出版，在台湾、香港等地也已出版了中译本。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国外曾有人对这本书提出疑问。如美籍学者夏志清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少女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娜·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剧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在哥大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日记》是伪造的。

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娜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一九八〇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西德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原子笔抄写的，而在一九四一——四四年间，荷兰国都根本还买不到原子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娜·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娜·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娜·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应邀参加了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的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Ingeborg Lesener）。我向她请教了《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到目前仍活着的有些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日记》决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现在，事隔三十年之后，本书在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也算得上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吧。

高年生

1985年8月—1989年2月

1942年6月12日

希望我能对你无所不谈，过去我还从未这样做过。但愿你能成为我的巨大支柱。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星期五早上六点我就醒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不能这么早起床，还得按捺一下好奇心，直到六点三刻。这时我再也无法坚持了，便跑进餐室。我们家的小猫咪莫辛在那儿以十分亲热的动作向我表示欢迎。七点过后我到爸爸妈妈房里，随后同他们一起去起居室观看并打开送给我的礼物。我头一眼就看到你，我的日记本，这肯定是最好的礼物了。我还得到一束玫瑰、几枝芍药和一盆仙人掌。这些是送来的第一批花，后来还送来不少。爸爸妈妈送给我很多礼物，我的朋友们也把我宠坏了，例如送给我的礼物中有一本《暗箱》^①、一套集体游戏玩具、好多糖果点心、智力玩具、胸针、一本约瑟夫·柯亨的《荷兰民间故事》，还有一本迷人的书《德茜山中度假记》以

① 这是一部在荷兰家喻户晓的写实幽默小说，作者贝茨(1814—1903)。

及钱。后来我还用这些钱买了希腊和罗马神话故事。太好啦！

后来，黎丝来叫我，我们一起去上学。我先把糖果分给老师和同学^①，然后才开始上课。

今天就到此为止。有了你，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星期六下午，我请了朋友们一起过生日。我们放了一部电影《灯塔看守人》（有狗演员林丁丁），朋友们都很满意。我们说笑打闹，大家都兴高采烈。男孩和女孩来了一大群。妈妈老想知道将来我愿意同谁结婚。我相信，如果她知道那个人就是彼得·维赛尔的话，她一定会吃惊的，因为每当她谈起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装得无动于衷。我同黎丝·古森斯和桑妮·霍特曼几年来一直在一起，她们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在犹太女子中学又认识了约比·范德瓦尔，我们常在一起玩，现在她是最要好的朋友。黎丝现在和另外一个女孩更要好。桑妮上了另一个学校，她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朋友。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我有几天没有记了，因为我想首先认真地想一想记日记的目的和意义。现在我要写日记了，心里有一种特殊的

① 这是荷兰过生日的风俗。

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曾“写”过什么。我认为，将来无论是我或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心里话感兴趣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我喜欢写，尤其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纸比人更有耐性。”每当我在情绪有些忧郁的日子里，两手托着脑袋，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时常会这样想。一忽儿我想留在家里，一忽儿又想出去，而大多数情况我总是坐在原地不动，继续胡思乱想。是的，纸张是有耐性的！我并不打算把这本叫做日记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的本子在什么时候拿给什么人看，除非是知心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因为别人对它也许并不感兴趣。现在我已说到为什么要记日记了：我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

我想更好地说明一下，因为没有人会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少女竟会感到这样孤独。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善良可爱的父母，有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的或者算得上是朋友的人共有三十来个。我有一群追求者，他们想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一切，甚至在上课时玩弄小镜子，直到逗我一笑为止。我有亲戚，有可爱的姑父、姑母和舅父、舅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本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同我的许多熟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除了说笑打闹、扯扯家常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不能畅所欲言，于是我就沉默寡言。也许这是因为我对人缺乏信任，但是现在既已这样，我又无法改变，真是非常遗憾。

因此，就有了这本日记。为了更加增强在我的幻想中

向往已久的知心好友的想法，我不愿象其他人那样只记下一些事实，而是要使这本日记做我的知心好友。这个好友名叫：吉蒂！

要是我没头没脑地开始，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同吉蒂的交谈的。因此我想讲一讲我的经历，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做。

我的双亲结婚的时候，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五岁。我的姐姐玛戈特于一九二六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接着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出生。我们是犹太人，一九三三年流亡到荷兰。父亲在特拉维斯股份公司当经理。这家公司和同一座楼内的柯伦公司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因为留在德国的亲人没有一个幸免于希特勒法律的种种迫害。在一九三八大年的大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去了。外祖母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七十三岁。一九四〇年后每况愈下。先是战争降临，后是投降^①，以后是德国人的进驻。现在灾难算是开了头。独裁的法律接二连三地发布，尤其是犹太人的处境特别糟。犹太人必须佩带星形标志，他们必须交出自己的自行车，他们不许再乘坐电车，汽车就更甭提了。犹太人只准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并且只是在犹太铺子里——买东西。晚上八点过后，犹太人就不准再上街，也不

①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纳粹德国进攻荷兰。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荷兰投降。

得在花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禁止到戏院、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去。他们也不准再去游泳、打网球和曲棍球，总之，不准再从事任何体育活动。犹太人不准再去拜访基督教徒。犹太孩子只能上犹太学校。这样的规定日复一日越来越多。从今以后，我们就完全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约比老是说：“我已经什么也不敢做了，因为我总是害怕那是触犯禁令的。”

外婆在今年一月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多么爱她，多么怀念她。一九三四年我进了孟特索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个学校里继续上学。去年校长K女士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到了年底，我们难舍难分地告了别，两人都流下了热泪。玛戈特和我后来——从一九四一年起——就上了犹太学校（女中），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此外，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还不错。我就这样到了现在和今天这个日子。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吉蒂：

我想马上开始动笔。此刻周围是这么宁静。爸爸和妈妈出门了，玛戈特到朋友家打乒乓球去了。近来我也很喜欢打乒乓球。由于我们这些乒乓球运动员很爱吃冰淇淋，特别是在夏天，因此打完球大都到对犹太人营业的食品店“特尔斐”或“绿洲”去。我们不用担心身上带的钱够不够。店里经常挤得满满的，因此我们在许多人中总会找到一些认识